

# 20世纪三十年代中外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

赵志浩

(南开大学 哲学系,天津 300071)

**摘要:**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进行了一场社会史论战,它实际上是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引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苏联和日本分别对之进行了解读,认定中国历史属于亚细亚形态的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将被排除在世界史进程之外。受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国史学家大多接受的是斯大林有关社会发展模式的论述,认为秦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属于封建社会,它改变了以后中国人书写历史的方式。

**关键词:**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史论战;社会性质;封建社会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9)04-0103-05

## 一、苏联和日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sup>[1](P38)</sup>。1906年,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逝世后第一次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自此后,不同国度、不同流派的学者参加此论争,论著迭出,观点纷呈,莫衷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一个引起世纪之争的历史之谜,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成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学术难题,人称社会科学的“歌德巴赫猜想”。

到底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东方社会是否属于这样的社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仅限于亚洲社会等等之类问题摆在了许多研究者面前。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20世纪在国际上出现两次讨论热潮,20世纪二三十年

代亚洲特别是中国革命兴起和发展之际,出现第一次讨论,第二次出现在六十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际。

我们首先看一下当初的苏联和日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1907年普列汉诺夫写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他认为,东西方的历史是按照两个不同模式发展的,西方的发展模式是: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东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原始社会——东方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西方的古代是指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制社会;东方社会即是指“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支配的社会,它是不同于西方古典古代的奴隶制社会,也不同于西方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社会,而是夹杂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一种生产方式。

苏联的瓦尔加接受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在1923年他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认为外国资本未入侵中国之前,中国社会即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

收稿日期:2009-05-06

作者简介:赵志浩(1981-),男,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哲学研究。

1927年上半年,中国大革命走向失败,就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共产国际展开激烈争论。中国革命应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土地革命是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基础,托洛茨基等人则认为,中国的封建残余并不甚多,主要任务是反对资本主义。12月2日至19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联共(布)中央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罗明纳兹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提出报告,提出中国现存农村的社会关系为封建主义,又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主义很少有共同之点,这种独特的封建主义可以用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概括。

后任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的马扎亚尔在制定中国共产党土地关系问题决议时,认为中国农耕需要大量的手工劳动,整顿水利、人工灌溉、防御天灾水祸等等对农业生产至为重要,这便需要巨大工程的建设 and 种种救济组织,再加上早期商业重利资本的发展,出现了游牧民族进行防御、侵扰和征服,也需要巨大工程的建设。这些情况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制度。

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六大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其中的《争取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和革命的主要类型》一节中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等以及一些独立国家(阿根廷、巴西等),其中有些国家工业还不发达,另外一些国家则工业相当发达,但大部分都缺乏独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中世纪的封建关系或‘亚细亚生产方式’还在经济政治上层建筑中占着优势。”

在共产国际六大第31次会议上,中共代表瞿秋白作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总结报告》,认为中国曾经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但现在政治上集权的政府、君主、皇帝已经不存在了,经济上早已存在土地私有制了,所以已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年代了。瞿秋白的见解未被大会接受。

1928年,马扎亚尔在《中国农业经济》中指出,20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度,整体上看,中国农村占统治地位的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国家实行专制统治,土地与河流的最高所有者是国家,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剥削的基本形式是接近于封建剥削方式的赋税地租。

1929年以后,苏联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调逐步占据上风,马扎亚尔宣布放弃中国存在亚

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认为应该到遥远的过去寻找。1931年在列宁格勒召开了一次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被看作托派的代言人,共产国际的官员约尔克指出要在政治上揭露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代表官方意见的哥德斯对马扎亚尔及其赞同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说他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根本问题上的方法论,而且还抹煞了现代东方的封建主义残余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出于对大和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以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关注,日本学者福田德三、伊藤藏平、早川次郎等,展开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例如早川次郎认为,日本没有经过希腊或罗马式的奴隶制,而从原始社会进入到了纳贡制的国家,这个纳贡制使日本跳过奴隶制,驶入封建社会。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势力的形成,对此问题的讨论染上了军国主义色彩,平野义太郎于1934年发表论文指出,中国仍没有踏入近代的行列,因为中国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格,无法发展出标准的封建社会,而日本已经摆脱亚细亚阶段,或者说,日本根本不曾经过亚细亚时代,日本已与西欧同列。秋泽修二原本赞成早川次郎的“贡纳制”说,1935年起放弃了这一看法,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亚洲的”奴隶制,中国社会的停滞性就是此种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日本侵华是资本主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克服。

如果这些说辞能够成立,将意味着中国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

## 二、国内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

1927年时,中国共产党想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分析近代中国的问题,可是,这一年国民党清党,国共合作分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而亚细亚生产方式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土地的国有制,如果否定了私有财产,向地主斗争的政策就成问题了,革命的正当性就受到了冲击。所以,第二年的中共六大检讨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放弃了这一概念,将中国视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如此一来,中国的前近代史就被视作了封建社会,而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解释中国前近代史的问题和讨论被限制在了学术界内部。

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展开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这场论争长达十年之久,涉及的问题很多,如亚细亚生产方式

问题、中国有无奴隶社会问题、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质问题、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问题等等。

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如何？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有没有封建社会等等，即是说中国历史能不能用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等的社会形态来划分？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等等。为找到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和前途等根本问题，需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作出人类史范围内的定位。

中国处在人类历史行程中的哪个位置上？中国是亚细亚专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问题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为了弄清问题，需要翻开历史。当现实遇到问题时，我们往往向历史回眸，妄图从过去发现点什么。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宋代儒学复兴不都是如此吗？人类总要回忆自己走过的路。当时的中国由社会性质论战走向社会史论战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社会史论战的观点纷杂，即使同一个人，前后观点也不完全一致。这是一个不断思考、不断论证的过程。

陶希圣(1899-1988)认为，周代为封建社会，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制瓦解，秦汉以后中国变为金融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后来，他又从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上重新划分中国历史：

- ①西周时代为氏族社会末期；
- ②战国到后汉是奴隶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
- ③战国至唐末五代是发达的封建庄园时期；
- ④宋以后至清鸦片战争前是先资本主义时期。<sup>[2] (P4-7)</sup>

社会史论战实际上是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引起的，如何看待亚细亚社会这一概念，是论战的焦点之一，论战者认为马克思早期曾把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和亚细亚社会视作一个等级的概念，但获悉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视它们为不同的范畴。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贯穿于论战的始终，争辩双方都引经据典，但意见分歧很大，侯外庐曾说，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不能研究中

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郭沫若也参加了社会史论战，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他表达过自己的看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引用了这段话，接着说：他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sup>[3] (P176)</sup>

郭沫若认为中国的商代是一个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他从卜辞等证明商代已有奴隶之起源，西周已为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开始了封建社会。郭沫若之前，人们多从“封诸侯，建藩卫”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认为自西周始中国便进入封建社会，到了战国封建社会才被破坏，后来才是奴隶社会，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大多这么认为。郭沫若提出西周奴隶说，改变了部分人以前的认知。认为中国也存在类似于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公社，即古代社会。

这颇似一个西欧历史进程的中国版，它奠定了中国“五形态”社会序列的前四列：

- ①西周之前 原始公社制
- ②西周时代 奴隶制
- ③春秋时代 封建制
- ④最近百年 资本制<sup>[4] (P265)</sup>

但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土地国有表明了国家已经存在，原始氏族社会中并无国家概念，亚细亚社会与原始社会并不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郭沫若的意图是很明显的：系列社会形态不独是欧洲的专利，你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我们都在经历一个相同的世界历史进程。可见，郭沫若是在有意抬高中国的历史，至少把自己拔高到和对方同等的地位。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寻找自己定位的过程，里面隐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民族自卑情节。

社会史论战之后，三十年代晚期，四十年代初期，郭沫若修正了自己的部分观点。例如，先前认为中国的古代社会始于西周，后来上溯为夏朝；开始否认井田制，后来又加以承认，并作出诠释；开始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类似于古希腊、罗马的劳

动奴隶制,后来又认为类似于斯巴达型的种族奴隶制,等等。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屈辱史,从鸦片战争书写近代史表明了这一点。

在强势文化诱惑下,中国史学家引用西方的概念来书写历史,这是阅读欧洲历史后的抄袭之举,把自己原本没有但渴望拥有的东西移植过来,并且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力。历史学家像是在书写自己的感受。

当然,也有一些论战者力图走出欧洲历史解释框架,例如梁园东认为中国没有封建社会,秦汉以后是农村商业社会;李季和胡秋原认为,西欧是经过前后相继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则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有一种过渡阶段,即亚细亚专制主义社会,也即是马克思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它发生于中国的秦汉以后和鸦片战争之前,此后中国社会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陈伯达认为战国以后中国社会是亚细亚形态的封建社会,等等。

总之,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观点繁多。1937年,何干之将社会史论战内容归结为三点:(一)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什么,中国会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是怎样?

直到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这场论战才不得不暂告结束。

抗日战争爆发期间,熊得山(1891-1939)在《中国社会史论》一书中提到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有关历史阶段的划分,他也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经常被引用的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但是熊得山看重的“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句话,他由此推知亚细亚的社会形态应当是最初的敌对形态,所以不能把其列入原始社会,而应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它不是东方社会仅有的特殊阶段。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大概与夏代相当;第二形态即古代的,相当于商代;第三形态即封建的,相当于周到清中叶的鸦片战争之前阶段。

总体上看,经过这场论战之后史学家接受了欧洲历史发展模式的框架,并用它来解释中国历史。

### 三、社会史论战对中国历史书写方式的影响

社会史论战中,一方认为周代以前是封建社会,秦以后皆为亚细亚专制社会;一方认为秦至鸦片战争时期为封建社会。后一种观点最终占据上风,人们普遍接受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属于封建社会,这一观念可谓深入人心,直至现在其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封建概念取得合法地位,在当时不知经过了多么激烈的争论和论证。中国人愿意使用封建社会一词概括几千年的历史,其中的原因复杂奥妙,政治的、心理的、感情的、环境的等各种因素才使得封建社会一词被反复使用,虽然使用者的标准和含义大相径庭。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回到权力分散的封建时代(如周朝的分封时代),意在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封土建国,这样便可使思想自由解放。清末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用封建一词比附郡县制,并与西方的地方自治相比,他们用语中的封建概念皆有分封、分权之意。晚清时期西方入侵和太平天国地方势力崛起,朝廷威势衰减,镇压太平军、办洋务等的运动使部分汉族权力集团势力增长,实际上形成了各种势力的自治,于是便有人用封建一词描述当时的社会状况。民国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不见了,到处是地方的割据势力,地方性的军事势力被称为封建军阀,这些都是从分权、割据意义上理解封建一词的。

五四时代是东西文化交汇和激烈碰撞的时代,封建一词的含义十分混杂,有的仍然沿用以前的分封、分权之意,有的则把其视作专制、落后、反动的代名词,有些学者不同时期使用封建一词的含义也不尽相同。然而到了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之际,对封建一词的理解贬义成分增多了,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视为封建社会是受了西欧、日本历史模式影响的结果。既然他们能够把自己前近代社会称为封建社会,我们为什么不能呢?他们的近代化运动是在反封建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当然也要反封建。社会史论战之际,苏俄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也在论战,斯大林认为中国为封建、半封建社会,这也直接影响了封建社会一词在中国的使用。

对于中国从秦至清的社会形态,欧美学者很少用封建社会一词概括,他们多用亚细亚社会或者东方专制主义称呼中国的这一段历史。如果将

中国历史囚禁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框架之内,意味着中国离近代社会还很遥远。而中国明明没有欧洲式的近代社会,那么,中国已经走过的漫长历史应该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社会吧,为了证明中国并未脱离世界历史的发展轨道,封建制度便格外受到推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也便与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甚至国民党右翼陶希圣就认为,中国在以往属于封建社会。后来终于把斯大林的社会发展阶段说全盘应用于解释中国历史,这样就可以与西方历史进行对比了,可以理清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了。

上述解释中国前近代史的模式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取得了胜利。郭沫若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社会史论战之后,他取代了陶希圣在论战中的主角地位。郭沫若用五阶段架构来书写整个中国历史,并把这种分析上溯到商、周两代,他以新出土的甲骨文作根据,证明中国存在过希腊、罗马式的奴隶制,这个结论被后来者认为很具有争议价值,但他对中国早期历史的解释,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说法。

这一段历史处于中外文化交织互动时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误用导致一些毫无意义的哲学问题,我们要说,语言的误用也可以导致一些很是麻烦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否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一个词的问题至关重要,例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概念来自于西方工业社会,传入中国后也用这一概念表示下层民众,但不具体的下层民众进行分析,就得出合理的认识,这就牵涉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问题。

旧史家以王朝更迭为基本框架研究历史,力图发觉历代王朝变更中的不变因素,不变即规律,也即是能够循环出现的东西。这是寻求历史规律的过程,这种历史只能是政治史。把政治史夸大为历史的全部就是旧史家的特征,最后得出的结论至多是历史的无限循环和往复,基本原因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历史人物、帝王将相无疑会成为这种历史研究的重点,历史考察终将变为对人性的考察,历史研究转变为对人性的研究,改造历史也只能从改造人性入手。自古至今,人性中必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历史怎么会超出人性自行发展呢?

但是,历史之外还有另外的历史,文明之外还有别样的文明,与中华民族截然不同的异族文明闯进中国时,循环几千年的历史模式有被中断的态势,这向旧的史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史学家重新思考历史规律提供了契机。他们发现,

历史的变迁不完全在于人性,而在于人之外的政治、思想、文化、技术条件等等,即便如此,还是没有跳出王朝更迭的基本历史框架。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史大讨论、大论战,史学家最终把对历史的考察圈定于经济史上,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认识历史的方式。

人类历史上,科学是不断进步的,经济是不断发展的,财富是不断积累的,这条线索里没有了历史循环往复的影子,把经济史夸大为历史的全部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最初接受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不过为历史发展寻求了一条经济史线索,这条线索构成历史运动的另一种规律,即单线发展的历史规律。有人说,循环论和发展论分别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结果,农业文明的循环周期性强,崇尚自然;工业生产周期很短,崇尚计划、人为等因素。即是说,两种历史观都有它的适用范围,一种学说能否战胜另一种学说,取决于学说之外的现实力量的较量。

不管怎么说,近代以来史学家已用另一种框架来书写历史了,诸如亚细亚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都是从社会经济形态角度考察历史发展和规律的概念。不管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是否是一回事,史学家竭尽全力用这些框架框定中国历史,把各个王朝的历史吸纳进这个框架中来,各个王朝更迭的历史框架被撕裂了,因为王朝的更迭不足以毁坏经济发展这条线索,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受王朝变更的影响,相反,它有自己的规律,并且处于更深的理论层面。近代中国人逐步接受了这条规律,并喜欢上了这条规律。人性的好坏不足论道,要紧的经济的发展、财富的扩张。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整体思路,工作的重心也在实践这条思路,从而也日益堕入单向度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只是随着单向度发展模式的危害暴露,新的反思才若隐若现地生长起来。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A].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C].神州国光社,1932.
- [3]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上海:现代书局,1932.
- [4]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侯德彤

(下转第120页)